

走向“三自”之路

——赵紫宸与燕京宗教学院的最后岁月(1948—1953)

邓阳

摘要：1949年前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院长赵紫宸的带领下走向了“三自”之路，先是积极参与了官方主导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继而从燕京大学独立出来，成为私立燕京宗教学院，并最终被并入了官办的燕京协和神学院，失去了长久以来的独立办学资格。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既是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师生的一出悲剧，也是20世纪中国教会本土化之路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缩影。

从1948年北平解放到1953年燕京协和神学院成立的这段时间里，燕京宗教学院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这些因素当中，有哪些属于是燕京自身的原因，又有哪些是外力的作用？作为燕京宗教学院灵魂的院长赵紫宸，是怎么思考的，又是如何领导师生们共同应对这些变化的？为什么一心追求基督教的本土化，同时也一度积极向新政权“靠拢”的赵紫宸会在燕大的三反运动中受到如此激烈的批判？赵的被批判对燕京宗教学院的命运又产生了哪些关键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赵紫宸心中的“三自”和官方的“三自”革新运动有怎样的区别和碰撞？

本文即是在研读燕京大学相关档案及赵紫宸等人个人材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文的目的有四，首先追问赵紫宸率领燕京宗教学院走向“三自”的动机所在，其次以赵紫宸及其弟子蔡咏春等重点人物的活动为线索，厘清1949年前后燕京宗教学院一系列变化的具体过程，

接着对燕京宗教学院和官办“三自”革新运动从合作到碰撞的转折提出自己的解释,最后则尝试以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的例子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本土化之路的艰难历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解读。

序 言

燕京宗教学院,原属燕京大学。1919 年燕大初立时为神科,1926 年正式挂牌为宗教学院,专门招收大学文理毕业生从事具有研究性的神学研究工作,因此也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负盛名的基督教(新教)神学院之一。有学者将其和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并称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对峙的两座高峰¹。但新中国建国以后,金陵神学院作为中国基督新教几乎是唯一的全国性神学院至今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之相比,当年曾同负盛名的燕京宗教学院则早已不复存在了。

1948 年底,北平解放,位于西郊海淀的燕京大学迎来了新的转折。1951 年 2 月,新政府全面接管了由美国出资兴办的燕京大学。神学院性质的宗教学院从燕大独立了出来,按照政府要求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申请立案为私立燕京宗教学院。燕大宗教学院以及私立燕京宗教学院,始终坚持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宗旨,从事神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但私立宗教学院只艰难维持了两年零四个月,就于 1953 年 6 月被政府连同北京其他各神学院,合并为全新的燕京协和神学院,燕京宗教学院自此无疾而终。而协和神学院,则在“党的领导”下,另行了一套新的神学教育模式了。与此同时,宗教学院的院长与“灵魂”赵紫宸也从“三自”革新运动最核心的领导者变成了燕京大学三名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不仅被迫离开了燕京宗教学院,从此也远离了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运动事业。

1 徐以骅《双峰对峙——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与金陵神学院之比较》,载徐以骅《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论》,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 年,第 119-142 页。

实际上,赵紫宸和宗教学院师生在解放前后对于新政权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并且是新政府推动的“三自”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实践者。作为中国基督教早期“三自”运动的发起者和新中国“三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它为何会遭遇如此命运呢?

燕京宗教学院的师生,特别作为在中国基督教界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院长赵紫宸,在这一过程中具体起了怎样的作用呢?新政权为何并没有因为赵紫宸的积极表现和主动参与,给予他和宗教学院以特殊的重视和出路呢?造成燕京宗教学院被新政权取消的原因根本何在?本文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准备以赵紫宸等重点人物的活动为线索,分析说明这段时间内燕京宗教学院与新政权从合作走向碰撞的复杂过程,厘清赵紫宸心中的“三自”和官办“三自”革新运动的同与异。

从更大的层面来说,“三自”革新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三自前后,中国基督教会的面貌根本不同²。但目前在中国大陆,对于“三自”和“三自”革新运动的研究仍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对海外及港台学者相关研究的回应也有所不足。本文对于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的研究,既是对既往“三自”革新研究特别是香港学者相关

2 三自革新的研究,在当下还有着一定程度的敏感性。目前在大陆,尚无一本有关1950年代三自革新的专著。在很长时间内,国外和港台学者对三自的研究走在了前面。

美国的Helen Ferris大概是最早从事三自革新研究的学者了,他的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ommunist China to 1952于1956年出版,主要还是从共产主义和基督信仰的关系来写基督教被清洗的必然性。Philip L. Wickeri的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 Movement, and China's United Front(《求同存异:新教、三自运动和中国的统一战线》)是英语世界当中对三自运动研究最深入的作品。

台湾学者查时杰的《中共“三自”教会与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关系初探》是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此文不长,但对于中国教会本色化的时期划分颇有特色。他认为,中国教会的本色化有四个时期:一是以西教士为主的栽种时代,二是中西合作的过渡时代,三是以中国人为主的自立教会时期,四是以中国人为主的本色教会时期。他对于中国人为主的自立教会和中国人为主的本色教会的划分颇具启发意义。但在中西合作这个问题上,中西是如何合作的,合作的真相如何,此文并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三自革新的评价,也流于批判而未能做出仔细、客观的分析,查文对于三自的观点代表很多海外、港台学者的看法。

研究的回应,也体现了放宽视界之后对于“三自”革新运动新的思考。

一、步履维艰:解放前夕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15年的汇文大学神科,燕大正式成立后,1925年改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首任院长是刘廷芳。1928年,名义上是校务长、实际上掌握校政的司徒雷登将赵紫宸从东吴大学挖来继任院长,自此燕京宗教学院进入了赵紫宸时代。

港台学者方面对三自研究做出比较大贡献的包括梁家麟、邢福增和赵天恩等人。其中,赵天恩的《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是解放之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通史性作品。但作者把三自革新完全看作是中共一手推动的产物,忽视了相当部分中国教徒的积极参与,也没有考虑到民国三自和1950年代三自的某种延续性。

梁家麟的《吴耀宗三论》和邢福增与梁家麟合著的《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代表了香港教会史学者对三自运动的研究水平。其中,《吴耀宗三论》是从三自革新领导人吴耀宗从非基到三自期间革新教会思想的角度来探讨自由派基督徒参与三自革新的动机和局限。而《五十年代三自运动的研究》是通过对比三自主要过程和参与三自基督徒各种不同动机的考察,试图得到三自一个比较全面的图景。除此之外,还包括上面提到过的《中国基要主义者的实践与困境——陈崇桂的神学思想和时代》,对三自中基督徒的心路历程,有着非常好的描写和参考价值。

此外邢福增的《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和《打扫房子——1951年的基督教控诉运动》是两篇高质量的论文,对《革新宣言》和控诉运动来龙去脉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学者的努力中,除了以《奋进的历程》这样的通史当中对三自的简单描述之外,有价值的参考读物不多。

1994年张化发表的《基督教早期“三自”的历史考察》在中国学者对本色化的探索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文中明确区分了早期三自和三自革新,认为前者是一个文化运动,而后者是一个政治运动。他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但同时也忽视了早期三自和三自革新延续性的一面,这一面,也是本文想有所补充的地方。

华中师范大学刘贵敏的硕士论文《武汉基督教控诉运动研究(1951—1955)》,是对三自当中控诉运动一个非常出色的个案,详细的解答了中共在武汉是如何推动控诉,并通过控诉去肃清帝国主义毒素的过程,但对于控诉下基督徒的心态没有展开讨论。把控诉运动的开展完全解释成中共一手推动的结果,也和本文的观察有着一定的差距。

总之,三自革新运动在海外和港台方兴未艾,但在大陆由于涉及到宗教和运动,仍有一定的敏感度。对于三自革新的真相,中国基督徒和三自革新的关系以及三自和民国本色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均有可以扩展的空间。

赵紫宸,少年时代就读于教会学校,1907年受洗入教;1914年入美国田纳西州梵德尔特大学专攻社会学和哲学。1917年毕业时获社会学硕士和神学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东吴大学教授、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1928年北上赴燕京大学,出任宗教学学院院长,1941年并出任过中华圣公会会长之职。1947年,赵紫宸应邀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获普林斯顿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访学期间,他曾多次出席基督教世界性会议,积极参加普世教会运动。1948年8月,他在参加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大会时,更当选为该会6名主席之一,成为主席中惟一的一位东方人。无论是在本色化神学的探讨还是中国基督教会早期的“三自”实践当中,称赵紫宸为最重要的先行者之一,实不为过。

正是在赵紫宸的手上,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完成了立院以来最重要的转变,即从一个差会严密控制下的单纯传道学院变成了一个致力于宗教和神学研究的高等研究机构。赵紫宸发表于1934年的《我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一文集中描述了他对于中国神学教育的憧憬,他认为燕大的宗教学院“应该做追求宗教的人的研究机关”,其研究所用的方法应该是“科学的”和“历史的”,并要加强对“中国人文方面的研究”³。在这样具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指导思想之下,燕大宗教学院相当程度上破除了原有的“传道院”色彩,成为本色化神学研究和教学的重镇。除了宗教学院主持出版的《真理与生命》、《紫晶》这两份全国性的宗教刊物,赵紫宸、吴雷川、刘廷芳等人的著作也都以其原创性和前瞻性在中国基督教界拥有极大的影响。在学生培养方面,从燕大宗教学院毕业的学生数量虽然不多⁴,但在质量上确是国内其他神学院所望尘莫及的,如毕业生许地山、吕振中、蔡咏春、方贻予等人都在日后的本色化神学教育和

3 赵紫宸《我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7期,1934年12月,第343-353页。

4 从建院以来截至1941年,正科毕业的学生仅76名。见《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46-1947周年纪念册》。

研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在赵紫宸的领导下,燕大宗教学院开始了中国基督徒神学研究本土化的初步尝试,也步入了它的黄金年代。

燕大宗教学院声名鹊起,但学院和学校的关系并非毫无芥蒂。名义上,宗教学院是燕京大学的一个下属学院,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远比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燕大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之时,按当时法律把宗教学院排除在外,宗教学院实际上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编外”学院,有随时被取缔的风险;另一方面,宗教学院虽有一栋宁德楼作为独立的院舍,教职员和学生却都没有独立的宿舍,而是打散和燕大各院系的同学散居在一起,这和基督教神学院较传统的“修道院式的”办学方式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也不利于宗教学院的凝聚力。更为关键的是,校方没有给予燕京宗教学院独立的财政权,院方所有的经费都要通过燕京大学进行统筹,而这和宗教学院在美国筹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又极不相称,故院方对校方在财政上常常不能按美国捐款人的意图分配用款,搞“暗箱操作”,颇为不满⁵。除此之外,赵紫宸是一个有较强民族主义情结的基督徒,他和司徒雷登这样的美国传教士在宗教学院的整体定位和办学理念上也有着相当的差距。以上种种都促使赵一度有过“院校分离”的想法和主张,并试图以此为号召为宗教学院争取更大的自主空间⁶。赵紫宸和宗教学院的独立愿望被司徒雷登反映到美国的主管机关——基督教联合托事部方面,在司徒雷登的影响下,“院校分离”的想法被否决⁷。这一波折难免不会给赵紫宸留下美国人究竟帮着美

5 徐以骅《神学家赵紫宸——兼论大学与神学教育》,载徐以骅编《中国基督教教育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6 徐以骅《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载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2-119页。

7 A.B. Garside, Letter to J. Leighton Stuart, November 28, 1930(UB Archives, Reel 188), pp.1132—1136.

国人,不肯给中国人放手做事的印象,赵紫宸和宗教学院师生对自传和自治的执着追求不得不说正伏脉于此。

中共解放北平前夕,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实际上处于一种极其困难的状态之中。首先,抗战结束后不久,宗教学院于1946年勉强复院,师资和生源都严重短缺,甚至于一度连正常的教学都无法进行。其次,司徒雷登也巧妙地对宗教学院施加人事上的影响。1946年的院长选举当中,宗教学院教授李荣芳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当选院长,好不容易从抗战的艰困中坚持下来,一心想要再展宏图的赵紫宸不禁心灰意冷,一度准备离开燕大⁸。

但就在李荣芳出任院长不久之后,司徒雷登就被美国政府请去担任驻华大使,离开了燕大,由陆志韦主持校政。燕大校政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落到中国基督徒手上。1947年,赵紫宸再度当选为宗教学院院长。院长职位失而复得,赵紫宸开始对宗教学院和燕大的关系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同时,国共内战越战越酣,中国命运面临重大转折的同时,宗教学院也面临着新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赵紫宸是一个虔诚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基督徒,另一方面,他又有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在中国基督教会中一直存在的所谓“自由派”(或称现代派)和“基要派”(亦称“原教旨基督教”)之争中,赵紫宸无疑是倾向自由派的神学理解的。“自由派”,也称本色派,一方面在宗教信仰中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不认为圣经至上;一方面支持建立一个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在这一派人当中,吴耀宗、赵紫宸等人是最重要的领袖。经历了“非基督教”运动的赵紫宸始终认为,中国的基督教会危机重重,早就需要改革了。中国基督教会固然源自西方,但中国教会要扎根中土就必须改革,而改革的重任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完成。这样

8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第122页。

的想法构成了赵紫宸参与并领导发起“三自”革新运动的基本逻辑。

实际上,赵紫宸的这一态度代表着相当部分对中国教会现实状态不满的基督徒的意见。包括赵紫宸在内,中国教会中国人办的憧憬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开始成为部分中国教徒的重要理想追求了,他们很早就提出要努力实现“三自”,即中国基督教应“自治、自养、自传”⁹。但是,在外国传教士占据着统治地位,且需要大量依赖欧美教会资助的条件下,这样一种努力始终难以成为事实。而1948年之后,内战形势逐渐明朗,即将到来的中共胜利,无疑给了部分积极主张实现基督教本土化的基督徒一个启示和鼓舞。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在新政权的一定帮助下,完成基督教本土化的目标。在赵紫宸看来,燕京宗教学院理当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全国基督教会的表率¹⁰。

赵紫宸的自由派倾向及其本色观念,不仅使他一向主张“三自”,而且也影响到燕京宗教学院的多数教职员,使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基督教会中一批主张改革的力量。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共新政权,燕京宗教学院的中国教职员基本上都选择了留下来。

二、未雨绸缪:赵紫宸为迎接新政权所做的努力

还在1947年重新当选宗教学院院长之际,赵紫宸就意识到校内和国内形势正在发生的大变化,可能会给自己一个大刀阔斧改革的契机。1948年从美、欧访学回来后,他就开始从多方筹措,力图确保宗教学院

9 “自治、自养、自传”这三自是19世纪以来“本色教会”(indigenous church)思想的延伸,部分外国传教士针对中国教会的发展最先提出了本色教会的原则: self-supporting (自养), self-governing (自治), self-propagating (自传)。简单来说,三自包括以下的内涵: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国外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10 《赵紫宸致蔡咏春的信》(1949年6月21日)。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燕京大学档案: YJ1944009/2,第134-135页。

能够在这一重要变动关头实现平稳过渡。

首先是师资的问题。此时的宗教学院,尚留有为数可观的英美籍传教士任教,如英国的修圣模、李霖朴,美国的范天祥、权雅各等等¹¹。这样的师资队伍,自然是谈不上“自传”,更是无法和新形势相适应的。在刚从瑞士回国的教会史教授王克私的建议下,赵紫宸下决心要配备一个“清一色的、拥护我的”教授班子¹²。他开始积极联系和鼓励宗教学院早期优秀毕业生回院服务,在不懈的努力下,从1948年到1950年底,方贻予、蒋翼振、蔡咏春这三名青年教师先后入院执教。除此之外,赵还注意挑选刚毕业和即将毕业的优秀学生留院重点培养,如韩宗尧、刘清芬、张士充等即被选中作为助理,用“以教代学”的办法留了下来。经过一番持续的努力,中共新政权建立之初,虽然外籍教授大都离开了北平,但宗教学院却变得人丁兴旺起来。老教授有赵紫宸和李荣芳,中年骨干有蔡咏春、方贻予、蒋翼振等,青年教师有韩宗尧、刘清芬、张士充等。宗教学院不仅首次出现了基本上由中国人组成的教学班底,而且老中青三结合的阵容,甚至比赵紫宸1928年到该学院任教时还要整齐得多¹³。

与人员上的调整相比,思想上的准备要艰难许多。面对政权更迭,燕京宗教学院的师生虽然在赵紫宸的鼓舞下对未来有所期望,但不能不对主张无神论的中共新政权感到一定的担心甚至是抵触。即使是那些和赵紫宸在“三自”上观点一致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在这一点上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保留意见。赵紫宸的“爱徒”蔡咏春¹⁴在这方面就表现得最为典型。

11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第124页。

12 同上。

13 同上。

14 蔡咏春,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神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各地从事基督教事工。抗战胜利后,他在赵紫宸的帮助下获得纽约协和神学院奖学金,于1946年赴美,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夏回国,任燕京宗教学院教授。详见《燕京大学史稿》蔡咏春条,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0-1152页。

新中国成立之时,蔡咏春人还在美国。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他本该于1949年回国,却迟迟未定归期。其展期固然与妻子黄秀兰生病有关,但也有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心存疑虑的因素。同为本色派教徒,他支持赵紫宸三自的主张,但同时他也认为中共和本土基督教的合作只能是短期的,一旦往下走则必然要发生冲突¹⁵。蔡咏春担心新政权迟早会威胁到燕京宗教学院立校之本,即信仰和学术的自由,因此,中共军队刚刚进占燕京大学所在的北平西郊,他就写信建议赵紫宸考虑宗教学院转移到南方甚至是海外的问题¹⁶。

和蔡咏春不同,赵紫宸更多地把共产主义的胜利和中共新政权看作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振兴的机遇而非威胁¹⁷。他告诉蔡咏春说,从基督教的观点看,共产主义确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但是,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也有很多共同点,特别是它们同样都起自穷人,同样都有理想主义,都主张世界主义。赵紫宸注意到,共产主义传入中国要比基督教晚很多,然而同样主张世界主义的共产党,在“中国化”和争取大众这一点上,却做得比基督教好很多。中国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向中国共产党学习呢?赵紫宸还强调说: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没有那么可怕,相反在动员民众、成功革命的实践上还有很多启发意义。因此,在新形势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去发掘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精神的内在一致性,是有利于中国基督教的三自事业的¹⁸。

身为基督徒,赵紫宸相信每一个信徒都应有基督那样的牺牲精神。故他用自己在抗日期间被捕的亲身经历告诉蔡咏春,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徒面对现实要做的不是在海外祈祷,而是真正投身到这场巨变当中,并尽可能地贡献自身的力量。他鼓励蔡咏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需

15 蔡咏春《1947年底退休会记录》。北大档案馆藏燕京大学档案, YJ1944009/3, 第34-35页。

16 《赵紫宸致蔡咏春的信》(1948年11月26日)。YJ1944009/1, 第86页。

17 同上。

18 同上。

无私无畏、改正偏见、不放走可能的机会”¹⁹。对于蔡所忧虑的信仰自由问题，赵紫宸一方面担保宗教学院绝不会做出和自身原则相悖的事情，一方面也告诉蔡自己对于新政权的观察，他认为新政权表现得相当开放和宽容，燕大的维持不是问题²⁰。

在赵紫宸反复耐心的劝说争取之下，蔡咏春最终克服了种种疑虑，下决心归国了，并且在建国初期宗教学院各方面工作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不难看出，赵紫宸及其他领导下的燕京宗教学院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保持着相当积极的态度，并一直努力尝试着想要和新政权真诚合作，甚至希望通过新政权的帮助，实现中国基督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目标。

也正因为如此，当1950年中共中央开始推动中国基督教、天主教走向“三自”时，赵紫宸及其宗教学院的教职员们就成了首批响应者和拥护者。

三、短暂蜜月：赵紫宸与中国基督教徒的《三自宣言》²¹

“自治、自养、自传”这“三自”主张，从字面上来说，就是指中国基督教会在内部事务、经济事务以及教义解释上都应独立自主，不靠外国人和外国教会。但是，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前为止，中国的基督教会还是未能改变自身“洋教”的形象，基督徒的数量和庞大的中国人口总量相比不仅是沧海一粟，而且完全无法离开国外基督教会（以英美为主）在人员、教义上的指导和在资金上的帮助。同时因为各国基督教派系林立，也造成国内基督教差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的复杂局面。正是因为无法改变

19 同上。

20 《赵紫宸致蔡咏春的信》（1949年6月21日）。YJ1944009/2，第134-135页。

21 《三自宣言》，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新华时事丛刊社编辑《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5页。

这种情况,所有积极主张变革和本土化的中国基督教神职人员或多或少都对一贯主张中国化的中共新政权,抱以某种期望。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新中国建立不久,新政权与主张本土化的中国基督教会的骨干分子一拍即合,很快开始发起了一个根本改变与西方特别是英美基督教会关系的“三自革新”运动。

“三自”最积极的推动者主要由基督新教“自由派”领袖组成²²。这时的自由派领袖中,又有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区别。吴耀宗的自由主义神学更为激进,一直以来都是“三自”最积极的推动者。相比之下,赵紫宸的本色化神学则相对温和,代表了既渴望本土化,又反对国内外任何干预教会独立自主的部分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意见。

新中国建立之初,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在1950年3月间的全国统战会议中明确提出,有西方背景的宗教必须要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²³。可以说,在建国初期,中共中央确实考虑到了基督教的特殊性和教会改革的长期性,一方面不反对教徒信教;一方面则明确主张鼓励、支持中国基督教会中的改革派实行“三自”。故当年5月间,周恩来即出面与吴耀宗等先后进行了三次长谈,将“三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动起来。

1950年7月28日,经由吴耀宗与赵紫宸等共同商讨拟就的《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即所谓《三自宣言》)正式发表。《宣言》公开宣告: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将会在政府的领导下和在“彻底拥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完成“自治、自养、

22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基督教代表五名:吴耀宗、邓裕志、赵紫宸、张雪岩、刘良模。1950年5月13日,周恩来接见的基督教人士包括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赵紫宸、崔宪祥、涂羽卿、艾年三、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赵复三、俞秀霭、杨肖彭、霍培修、陆志韦、庞辉亭、陈文润、刘维城、郑锡三。均为新教自由派人士。

2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85-186页。

自传的运动”²⁴。

此时的赵紫宸,由于其在神学研究和宗教教育上的地位和贡献,新政府予以了较高的政治待遇。他既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是基督教五名与会代表之一,同时又是北京市政协常委和救济总署监委²⁵。作为《三自宣言》四十位发起人之一,他对于宣言里的基本提法当然是热情支持的。他的支持,毫无疑问是主持燕京宗教学院以来一系列主动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宣言提出的两大方针——“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确实一直以来也正是他追求的一种目标。

对于所谓的“帝国主义影响”,随着司徒雷登的离校和全国的解放,燕京大学包括宗教学院在内的内部事务实际上已经完全掌握在中国教徒的手里了。而对于宗教学院的“自治、自养、自传”,在赵紫宸看来,也正在努力实现之中。中共占领北平之后,学院内的外国籍传教士基本上已经离校,或回国,或南下,学院组成了近乎“清一色”的中国籍教师班底,已经实现了“自治”。学院教学课程,也都由学院自行决定,且自主开设了有关辩证法的课程,积极推动学生和教师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也基本上实现了“自传”。因此,赵紫宸一度甚至觉得,自己和燕京宗教学院已经走在了全国基督教界的前列。

但是,“自养”的问题却是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始终难以解决的。

长期以来,宗教学院一直靠美国托事部的基金维持,同时也因为追求地位的超然和研究的自由,宗教学院一向不和中国本土差会发生联系,也就一直没有得到本土差会在经济上的支持。赵紫宸清楚,对于《宣言》所提出的“中国基督教今后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

24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年,第11页。

25 《燕京大学史稿》赵紫宸条,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148页。

者,应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²⁶ 的目标,一时半会儿几乎不可能实现。尽管赵紫宸这时也想尽办法在国内找钱,但他还是寄希望能维持现状,继续使用一段美国的援款,再慢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推动的“三自”和赵紫宸理解的“三自”之间巨大的距离。在中共方面,“三自革新”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割断与中国基督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关系,包括经济上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的基督教会及其教徒完全统一到共产党的领导下来。但在赵紫宸看来,“三自”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在巩固和发展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基础上的,因而其步骤、方法和进度,必须照顾到中国基督教事业生存发展的实际,稳步进行。尽管,中共中央也会顾及到中国基督教徒目前的种种局限,主张对三自运动的推进“不宜太急,太硬性”,但它所关心的,却并不是中国的基督教会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而是太急、太硬性,一旦在基督徒中“造成对立”,会“失去团结较多人的机会”,使改革派的基督教领袖诸如吴耀宗等,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从而影响到全国几百万基督徒和新政权的关系,不利于实现党对基督徒的统一领导²⁷。但是,它关于必须马上割断中国基督教会与西方关系的任务目标,却是不能改变,且不能稍有折扣的。基督教会经济生存的问题,对于已经掌握了全国各级政权的中共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事实上,从吴耀宗领导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到各地的分支机构,随后都是得到政府的经费支持的。问题在于,要像过去一样来维持全国大大小小各种神学教育机构,对中共来说,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必然会有所取舍,而取舍的标准自然就看政治上的“进步”与否了。

对于一贯走在“三自”前列的燕京宗教学院,中共当然有所期待,希

26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第11页。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97页。

望通过接受政府津贴的方式,彻底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成为三自运动的表率 and 典型。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政权和赵紫宸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对于赵紫宸等人来说,真正的自养既指的是要切断和美国方面的经济联系,也意味着在接受新政府政治上的指导的同时,在经济上和教学上保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左手拒绝国外的资金,右手去拿新政府的津贴,“自养”还是自欺欺人。

对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尤为不利的一点还在于朝鲜局势的变化。《三自宣言》发表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出兵朝鲜并封锁台湾海峡,已经与新中国处于准战争状态。而就在《三自宣言》发表后不久,新政府出兵朝鲜,与美国兵戎相见。在这种情况下,赵紫宸想要维持现状,也没有可能了。

四、分道扬镳:私立燕京宗教学院的短暂岁月

1950年11月中国出兵朝鲜后,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的各种民间的交往,包括宗教往来关系,很快就被两国政府冻结了。

12月16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冻结中国教会的津贴以及公私团体在美国的资财。中国随即反制,中央政府于12月28日发布命令,管制美国在华财产,这其中大多数为教会财产。同一天,中共中央颁布命令,要求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采取登记和接办的办法,与美方脱离关系。随后,政务院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和《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²⁸。至此,以朝鲜战争为契机,中共新政权实际上放弃了“三自”运动初期相对谨慎的态度,转而在国家接管接办的方式,一步到位地实现了“肃清美帝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势力”的目标²⁹。

2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510页。

在这种情况下,依赖美国经费生存的燕京宗教学院的厄运也就很难避免了。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赵紫宸作为北京宗教界代表之一,就发表宣言,号召宗教信仰徒签名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等罪行³⁰。随后,他更公开声明,辞去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主席之职。燕京宗教学院教师和学生这时也积极参与了北京基督教团体的各种抗议活动。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大使奥斯汀公开宣扬美国基督教会对中国的种种帮助之后³¹,燕京宗教学院的师生们更是出面组织大游行,起了“带头作用”³²。

然而,以上种种的“进步表现”并不能解决摆在燕京宗教学院面前的有关生死存亡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燕大被政府接管之后,宗教学院何去何从,是随着大学被接管,还是自立门户?第二、如果从燕大分出去,如何解决“自养”的问题;如果不能“自养”,将何以保证自治、自传的独立地位?

实际上,对第一个问题,赵紫宸早有了自己的答案。长期以来,赵紫宸对于燕京大学和宗教学院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极为不满的。这里面,既有院校财政不分的纠葛,更有宗教教学主张上的问题。赵紫宸一直希望宗教学院能够脱离燕京大学独立。如今同样依靠美国教会资助的燕大将被政府接管,宗教学院也就对自己的前途有了新的选择的可能。因此,当燕大校长陆志韦建议宗教学院可改组为研究中国各宗教的纯粹学术机构继续留在燕大内的时候,赵紫宸明确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表示要率领宗教学院独立出去³³。

1951年2月12日,中央政府正式宣布接管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自

29 《肃清美帝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势力》,《人民日报》1950年12月30日。

30 罗广武编《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8页。

31 《反对美帝文化侵略运动》,《新华月报》第3卷第3期,第654页。

32 旷愚《燕京宗教学院的新生》,《新燕京》,1951年5月20日。

33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第124页。

此脱离了燕大,成为独立的燕京宗教学院(亦称私立燕京神学院)。而这个姗姗来迟的院校分离带给赵紫宸的,却不是夙愿得偿的喜悦,而是无穷的麻烦和困难。

宗教学院要想不垮,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向政府伸手就行了。因为,在奥斯汀已经公开宣布说没有美国津贴,中国的教会及其学校将难以生存³⁴的情况下,中共新政府很难听任宗教学院因经费不足而瓦解。这时,政府负责人也曾向宗教学院表示,经费如有困难,国家可以津贴³⁵。赵紫宸对此也很清楚,“党把一切愿意与党合作的知识分子包下来,也会设法使宗教学院按照实际的需要,改组或继续下去”³⁶。然而,这个“包下来”,在赵看来,其代价是宗教学院难以承受的。因为,“接受津贴就没有自由”³⁷。为了保持学术上和宗教上的自由,以及真正地实现“自养”,这个时候的赵紫宸和宗教学院的多数师生,仍旧想要通过自力更生,以保证宗教学院的独立地位³⁸。

在这时宗教学院的师生们看来,三自中的“自养”指的是经济上完全的独立。这个独立,既是要独立于外国人,也是要独立于本国政府的管制。否则,就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三自”。独立建院的私立燕京宗教学院,正可以借此机会实现一直未能做到的“自养”,成为中国教会里“三自”的旗手。

为了做到自养,宗教学院这时多管齐下,既开源,又节流。

节流方面,从赵紫宸开始,所有的教授均领半薪³⁹。这样的做法,一

34 《反对美帝文化侵略运动》,《新华月报》第3卷第3期,第654页。

35 蔡咏春《我和赵紫宸的关系(二)》(1968年7月27日),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藏蔡咏春档案 RG205,7-6-6。

36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第124页。

37 蔡咏春《我和赵紫宸的关系(二)》(1968年7月27日)。

38 蔡咏春《彻底转变立场、迎接思想上工作上的大跃进!》(1958年6月26日),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藏蔡咏春档案 RG205,7-3-4。

39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第125页。

来容易引起矛盾,二来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关键还在开源。

开源方面,首先,赵紫宸认为,美国钱不能要了,英国钱还可以要,他因此试图接洽香港方面圣公会的何明华⁴⁰,争取得到部分资助的款项。其次,宗教学院计划组织董事会,请名誉董事若干人,赞助人若干人,并与教会联络,多方请人帮助筹募款项⁴¹。最后,赵紫宸设法获得了宗教事务局的募捐许可,开始四处募捐,并在敬奠瀛领导的山东马庄耶稣家庭那里,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⁴²。

这些,在赵紫宸看来,无疑都是为了实现宗教学院真正“自养”的正常手段。但是,在这时的中共中央看来,允许赵紫宸宗教学院“自养”,就意味着纵容赵及其宗教学院拒绝党和政府的领导,等于在已经纳入到党的领导轨道的“三自”之外另搞一套。赵紫宸和宗教学院越是能够靠“自养”而生存,就越反映出其“错误”和危险的严重性。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看来,“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本是一丘之貉,赵紫宸向英国圣公会求款,还是内心深处不愿和“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表现。敬奠瀛领导下的山东马庄“耶稣家庭”,则是中国本土基要派信众的重要团体,赵宁可要耶稣家庭的钱而不要政府的津贴,更被视为纠集基督教落后势力对抗三自”的体现。在这样的形势下,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的所作所为,无疑和吴耀宗、刘良模等新教领袖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⁴³。至此,赵紫宸被视为另类,被批判并“靠边站”,以及私立燕京宗教学院最终要被政府合并掉,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对于新生的燕京宗教学院的立案请求,当局采取了“拖”的态度,直

40 何明华,时任香港英国圣公会主教,和赵紫宸有比较深厚的往来。

41 《燕京宗教学院今后的路向》,《天风》第261期,1951年4月28日。

42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第125页;蔡咏春《我和赵紫宸的关系(二)》(1968年7月27日)。

43 如邢福增先生就认为,吴耀宗和赵紫宸之间的路线斗争和个人嫌隙造成了日后赵紫宸的悲剧命运。详见邢福增《中共建国前会赵紫宸的教会改革观》,载《建道学刊》,1997年第7期。

到私立燕京宗教学院结束,都未能获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立案认可。没有立案,宗教学院实际上处于一个“非法”的状态之中,这无疑已经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不接受政府津贴、又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宗教学院是不会在得到新政权的认可的。

既是私立燕京宗教学院院长,同时又属于燕京大学编制、在燕大支薪的赵紫宸,成为中共整改宗教学院的突破口。在1952年初燕大展开的“三反”运动中,赵紫宸作为三名重点对象之一受到批判,并被“批倒批臭”⁴⁴。他反复检讨,仍过不了关,最终被免去了院长一职,宗教学院也因此陷于瘫痪⁴⁵。

与此同时,学院内积累的人事矛盾在运动中爆发出来,学院内部教职工分成了两派,“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抗局面”⁴⁶。部分和赵紫宸想法一致、受到赵紫宸重用的年轻老师被打成赵的“爱徒集团”⁴⁷受到批判,中共也派出干部到学院里“协助运动”,实际上把学院的领导权掌握到了手中⁴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私立燕京宗教学院已经难以为继了。

在一年左右的学习和控诉运动之后,1953年4月,先前曾被肯定是“基本上对美帝国主义打了一个胜仗”⁴⁹的私立燕京宗教学院,被整合进了新政府资助的新的燕京协和神学院中去了。而这个在“政府指导”和“三自革新委员会领导”下的燕京协和神学院的诞生⁵⁰,标志着华北地区三自运动的顺利结束。而对于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来说,他们所努

44 另两位分别是燕大校长陆志韦和社会系教授张东荪。

45 蔡咏春《进一步检查思想,追溯根源》(1957年10月9日),耶鲁蔡档 RG205,7-3-3。

46 赵紫宸《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第126页。

47 “爱徒集团”以蔡咏春为首,包括张士充,张秀,韩宗尧等人。见黄秀英叙述、韩宗尧整理《我的伴侣蔡咏春》(自印本),第89页。

48 蔡咏春《彻底转变立场、迎接思想上工作上的大跃进!》(1958年6月26日),耶鲁蔡档 RG205,7-3-4。

49 蒋翼振执笔《燕京宗教学院的学习和控诉运动初步总结》,《天风》第294—295期,1951年12月22日。

50 同上。

力进行的“三自”试验,却完全失败了。

结 语

燕京宗教学院“三自”革新之路所体现出来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实际上正是 20 世纪中国教会本土化之路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在美国托事部卵翼之下的燕大宗教学院,所有本色化的尝试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解放后,为了学院的继续存在,宗教学院和其领袖赵紫宸都采取了相当务实的“进步”姿态,并一度在“三自”革新运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朝鲜战争爆发所带来的国际国内局势变化,打破了新政权和宗教学院关系的短暂蜜月。坚持独立自主办学,走自己“三自”之路的宗教学院从收归国有的燕大分立出去,而拒绝政府津贴,真心想要实现“三自”的结果,却和政府主导的全国基督教界“三自”革新运动的目标渐行渐远,竟至成为一种抗拒改造的表现。结果,赵紫宸被批斗、打倒、靠边站,原本就危机重重的宗教学院也不复存在了。

纵观此一过程,最关键、同时也是争议最大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促使燕京宗教学院走上“三自”之路的原因何在?第二、又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两个“三自”之间的分道扬镳并最终导致了宗教学院和赵紫宸等人的悲剧命运?

对于第一个问题,通过对解放前夕宗教学院一系列改革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燕京宗教学院走上“三自”之路,既是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基督徒本色化发展的一种必然。与其说新中国的成立促使宗教学院走上了“三自”之路,倒不如说赵紫宸和宗教学院的教徒们主动迎合这一政治形势变动,毅然决然另起炉灶,走自己的路的一种大胆尝试。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的“三自”,完全是自发的、自主的,如果没有政权的强力干预,这条路未必完全走不通。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燕京宗教学院在新中国建国后走上“三自”之路,纯粹是现实政治压迫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前贤有过非常深入的讨论⁵¹。总的说来,他们普遍把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的悲剧命运解释为“三自”运动政治化的结果,是政治权力试图对“三自”运动和基督教界进行全面控制后的必然。考察私立燕京宗教学院的短暂历史,此说大抵不差。从根本上来说,要不要党的领导是两个“三自”分道扬镳的关键。但问题在于,仅仅从“三自”运动政治化的角度去解释赵紫宸和宗教学院的悲剧命运是不够的。

首先,“三自”革新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反帝”和反美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新政权对中国本土基督徒的“忠诚测试”,这一点,包括赵紫宸在内主动参与“三自”革新的基督徒们对此完全是了解的,也大多是自愿站在新政府一边的。“政治化”实际上不是问题,问题是对于政治渗入宗教信仰的边界,以赵紫宸为代表的部分基督徒和新政权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

其次,光从外力的角度去做出解释实际上掩盖了宗教学院实行“三自”致命的不足,即“自养”的问题。早在解放前夕宗教学院自发的改革中,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基督教神学院的脆弱和局限早就尽显无余。外国的传教士可以请走,教义和课程也可以自行决定,但经费除了仰仗美国资金之外并无替代办法。而我们知道,对于这样纯粹的神学研究院来说,经费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情况上的不独立,决定了燕京宗教学院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三自”,有没有政治干预都是如此。

换言之,即使中共新政权不对私立燕京宗教学院全面干预,以其当时的经济状况,实际上也是支撑不了多久的。新政府对它的整改,只是大大加快了它走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总之,当年条件下,一个弱小、涣散、四分五裂,经济上不独立的中国教会,是支撑不了燕京宗教学院这样的神学机构的。这既是燕京宗教学

51 见前引邢福增《中共建国前会赵紫宸的教会改革观》及梁家麟《无能者的无能——一九四九至五一年的赵紫宸》,载《建道学刊》,1998年第9期。

院の悲哀,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发展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一点,易为研究者所忽视,也是燕京宗教学院悲剧最发人深省的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中国基督教会的“三自”历程远有着比我们今天的认识复杂得多的面向。“三自”革新运动固然是一次悲剧性的政治运动,但走到这一步,确实有着“不得不如是”的某种历史必然性。因此,我们对于“三自”研究的关注点,也应从对“三自”是什么的争论,转到为何会发生“三自”革新运动的问题上来。也就是说,对于“三自”革新,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它走进历史舞台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中国基督教为何最终要以“三自”革新这样激烈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完成自身的本色化的原因所在,不如此,就不能真正客观全面地认识“三自”,也就很难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把握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特点。而赵紫宸和燕京宗教学院的故事,正是这个过程最好的一个注脚。

「三自」への道 ——趙紫宸と燕京宗教学院の最晩期(1948—1953)

要旨：1949年を前後して、燕京大学宗教学院は院長趙紫宸主導のもと「三自」路線へと舵を切り、当初は積極的に政府主導のキリスト教「三自」革新運動へ参加し、さらには燕京大学から独立して私立燕京宗教学院となり、最後には官立の燕京協和神学院に編入され、長年来の独立した教育組織の資格を失った。曲折と複雑さを伴ったその具体的過程は、趙紫宸及び燕京宗教学院の教員と学生に起こった一つの悲劇であったと同時に、20世紀中国のキリスト教会の本土化路線における涙なくしては語れない物語の縮図でもあった。

1948年の北平解放から1953年の燕京協和神学院の成立までの期間に

において、燕京宗教学院では一連の重大な変化が起こったが、どのような要素がこうした目のくらむような複雑な変化を生んだのだろうか。こうした要素のうち、どういったものが燕京宗教学院自身に起因しており、どういったものが外部の作用によるものだったのだろうか。燕京宗教学院設立の中心人物であった趙紫宸は、どのような思考で、また実際にどのようにして教員や学生を主導してともにこうした変化に対応したのだろうか。なぜ一心に基督教の本土化を進め、一時は積極的に新政権と「接近」した趙紫宸が、燕京大学の三反運動において激しい批判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だろうか。趙紫宸に対する批判は燕京宗教学院の命運にどのような決定的な影響を及ぼしたのだろうか。そして根本的な問いとして、趙紫宸の抱いていた「三自」と政府の進める「三自」革新運動との間にはどのような差異や衝突があったのだろうか。

本文では、燕京大学に関する檔案史料及び趙紫宸をはじめとする人々の個人文書を読み解くことでこうした問いに答える。本文の目的は以下の四つである。まず、趙紫宸の主導によって燕京大学宗教学院が「三自」路線へと舵を切るようになった動機の所在を明らかにする。次に、趙紫宸及びその弟子である蔡咏春といった重要人物の活動を糸口として1949年前後の燕京宗教学院で起こった一連の変化の具体的な過程を整理し、さらに燕京宗教学院と政府の「三自」革新運動が協調から対立へと転換する過程について独自の解釈を提示する。最後に、この趙紫宸と燕京宗教学院の事例によって、20世紀前半の中国における基督教の本土化路線にみられた苦難の歴史を新たな視角から読み解くを試みる。

March to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T. C. Chao and the Last Days of the Religion School of Yenching University (1948–1953)

Abstract: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Beijing by the end of 1948, the famous School of Religion of Yenching Universi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its Dean, T. C. Chao, began to forge its path toward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The intricacy and complexity during this process is undoubtedly the perfect epitome of the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society.

What had changed between 1948 and 1953 for the Religion school of Yenching? What factors had led to such a tremendous change? Among all these factors, which are external and which internal? As the soul of Yenching Religion School and one of most famous Chinese Christians at that time, how did T. C. Chao, and his colleagues, cope with all these changes? Once a committed supporter of a New China and a new Chinese Church, why was he met with severe criticism afterwards; and how did these factors affect the fate of the Religion schoo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 C. Chao's activities between 1948 and 1953. By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bov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Yenching Religion School and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and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